

中国图书馆学史序论

谢灼华

一 序 说

“图书馆学是一门既古老又年轻的科学”，我们经常可以听到图书馆界的同志们这样评价图书馆学。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有的同志只说到汉代有目录学，二十世纪有图书馆学，没有明确地指出古代图书馆学有哪些著作，有哪些学说，取得过哪些成绩，那么，“既古老”的说法，只是一种比较性说法而已。

三十年代有人提出“中国无分类法”、“中国无目录学”的论点。无论从当时什么背景下的认识，这种看法终究是偏颇的，不全面的。

“图书馆学是二十世纪以后出现的”，这又是一种看法，究其本意，实质上是指我国近代图书馆学而言。无可讳言，我国近代图书馆事业的兴起是在十九世纪末叶。二十世纪以后，适应图书馆工作的需要，我国学者分别从介绍西方图书馆技术，融合中西图书馆学说，加以改造、提高，逐步发展起中国近代图书馆学，亦即资产阶级图书馆学。如果从近代图书馆学的产生而言，说是二十世纪中国才有图书馆学，那是可以接受的。但是，统而言之，图书馆学是二十世纪以后出现的，这种表达是不准确的。

学术研究中出现各种不同的意见，这是

客观存在，过去有这种现象，今后永远会有这种现象出现，这并不可怕。但是，牵涉到中国图书馆学史研究上的种种看法，有些是必须澄清的，有些当然是可以深入研究，不断探讨和争论的。因此，分析一下关于中国图书馆学史的一些典型论点，是非常必要的。

图书馆学是否是一门科学？持有这种看法的同志，当然不会认为中国有图书馆学的发展史了。

古代只有目录学，当时并没有形成图书馆学。所以，中国图书馆学发展是近代才出现的。

古代只有藏书管理(图书管理)的知识，并没有系统的图书馆学。因此，中国古代只有藏书管理的经验总结，并没有形成图书馆学的“学科”体系。

古代只有藏书经验的总结，没有系统的藏书思想体系(理论)，这能说是图书馆学吗？

产生以上这些看法是不奇怪的，除了认识上的原因外，还有属于我们学术研究上的一系列问题，诸如学科内容深度、学术理论与技术方法的关系，研究力量和水平，以及其他社会因素等。

图书馆工作是实践性较强的工作，长期以来，人们比较重视图书馆工作的各个方面，诸如图书采集，整理加工，提供图书文

献为读者服务等方面的研究，至于图书馆学理论上的诸多问题，一直未花力量、下苦工夫组织去做，存在着深度不够和理论化、系统化不强的缺陷。因此，我国产生过哪些图书馆学基本思想和理论，图书馆学的体系包括哪些，图书馆学学科的层次与结构如何等问题，都没有系统地整理和研究，人们提出的图书馆学的疑问也是必然的。

图书馆学各学科发展的不平衡，也导致了客观上的种种议论的出现。图书管理与利用的理论与方法研究，直接推动了图书馆工作的发展，提高了图书馆工作效率。但是，图书馆学的内容是多方面的，从整个管理系统来看，把图书馆办成社会事业的一部分，就应加强图书馆组织与图书馆事业的研究，这正是解放三十五年来，图书馆学研究的薄弱环节。从认识规律来看，吸取成功经验，应用于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和规划，总结历史教训，避免重犯过去的错误，就应加强图书馆史和图书馆学史的研究。但这种研究并未安排在我国图书馆学研究的重要地位上。解放以来，我国没有出现一部图书馆史或图书馆学史专著，说明了我们研究工作上的薄弱。

学术研究上的实事求是之风是十分必要的。二十世纪以来，我国古代藏书楼和藏书管理经验的研究，往往因为某种政治因素社会因素的影响而受到干扰。我国新图书馆运动兴起，批判了旧的图书馆(藏书楼)，但是，当时，学术工作者都未能比较全面地分析古代藏书楼的成功经验，未能积累必要的资料。图书分类学的成绩较大，但对图书分类上如何解决古今统一分类的问题，并没有在理论上加以说明。随着新的技术方法的采用，对传统图书馆学的总结和新的技术方法的推广，往往又顾此失彼，这也是一种不实事求是的态度。所以，我们在回顾这些问题的争论时，要分析这些看法产生的历史原因。

对于什么是图书馆和图书馆学，图书馆学是否是一门科学，这个问题已经逐步解决

了。所以，我们在这里，不准备系统地讨论什么是图书馆学的问题。而比较着重讨论的是我国有没有图书馆学发展的历史，也就是中国古代能否形成图书馆学，以及中国古代图书馆学的内容包括哪些，有哪些主要论著，从而证明中国有图书馆学发展的悠久历史，应该建立一门《中国图书馆学史》。

二 界 说

中国古代能否产生图书馆学？或者说，古代关于藏书管理的知识(经验)能否称作图书馆学的范围？

回答是肯定的。

科学是在社会历史生活过程中所积累起来的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的各种知识体系，是知识的长期发展的总结。

人类的一切知识都来源于实践，人们在实践过程中直接所取得的经验，以及继承、吸收、分析、批判前人积累的各种经验(即知识的积累)，逐步形成对某一种事物的规律性的认识，那么，这种认识就是一种知识体系。图书馆学的形成正是经历了这种科学发展的一般过程。所以，如果承认古代图书馆工作内容是一种社会实践活动，而这种社会实践活动是不断发展和不断丰富的。漫长的封建社会中，丰富的图书馆工作内容必然逐步促进了图书馆工作知识和经验的积累，因此，也就逐步孕育了古代图书馆学的产生和发展。

作为图书馆学产生或形成的主要标志，大致可以概括如下：

一、由于社会文化的发展，图书馆作为一种独立的事业出现以后，必然出现有这种事业的工作程序与管理系统，即现在说的图书馆工作，这决定了产生图书管理知识的可能，并综合发展成图书管理知识体系的条件。

二、由于图书馆的发展，根据担负任务不同与读者对象的不同，形成了各种类型的

图书馆，必然出现图书馆概况的研究。图书馆由单一的发展成多样的，或者一个朝代变成连续几个朝代的图书馆，记述王朝藏书兴替沿革的文字出现了，把图书馆作为一种事业与其他文化事业综合进行研究成为图书馆事业研究的内容。

三、由于以上图书馆工作和图书馆事业的研究，开始出现的是单篇文献，以后逐步出现系统性的专门著作。这就是图书馆学的产生。

科学史的发展告诉我们，作为一种知识体系的建立往往是由粗糙到精细（作为描述内容上来说），由零碎到系统化（作为阐述原理上来说），也就是由低级向高级方向逐步完成的。图书馆学的产生与发展也是经历过这样的一个过程。

现代社会中，图书馆的作用表现为图书馆和作为图书馆的读者，即社会各阶层及其从事活动的各种机关和行业的相互关系，表现为图书管理和图书的使用的相互关系，同时，也表现为图书馆藏书利用和读者需求所必然产生的矛盾现象，因此，逐步出现了包括图书馆学理论，图书管理方法，读者服务与文献、目录研究，以及图书馆史与图书馆事业的多内容的图书馆学。又因为图书馆的发展与其他学科的相互影响，图书馆学的研究必然联系到其他学科与图书馆学的关系，因此，图书馆学内容更为丰富，体系更加完善，这就决定了现代图书馆学的基本内容是多方面的。

然而，古代图书馆学的内容与现代图书馆学的内容是有区别的，当然，其中有必然的联系和相互承袭的关系。

笔者在《公藏是主流》的文章中，曾经表达过这样的基本看法：延续二千年的封建主义，表现出来的特点是：长期的封建生产关系改变缓慢，政治制度是皇权集中于一身的封建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而思想统治的特点则是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因此，中国封建社会图书馆的发展是在众多的图书馆类

型中，封建中央政权的皇家图书馆是所有类型图书馆的主流。而在图书馆工作内容和方法上，包括图书馆藏书的收集，整理与利用，也是突出地以收集、整理、宣传、利用封建思想的主体——儒学之书作为主要内容。正因为这样的特点，决定了封建社会图书馆工作的内容是以保藏为主，即表现出的特点是管理程序与制度的集中，严密和封闭性。所以，汉至五代，图书馆工作集中是搜求——整理——编目，就是在雕版印刷术盛行以后，图书馆工作仍旧是以内部整理为主，提供使用为辅。基于以上的认识，大致可以把封建社会图书馆学内容归纳为：

1. 藏书沿革与馆阁制度的记述；
2. 藏书建设理论与方法的研究；
3. 藏书管理方法的研究；
4. 典籍作用和藏书利用的认识；
5. 公私藏书史料的汇辑。

当然，这些方面的内容并不一定是中国每个朝代图书馆学发展史都具备的，而且有些方面的内容的理论高度也是有差别的。但是，这些方面构成了古代图书馆学的总框架。

三 概 说

中国古代图书馆学的产生和发展经历了相当长的历史时期。

图书馆出现，有了图书搜集与整理等工作，并不就出现了图书馆学。图书馆学的出现，是在事业发展，工作多样，人员稳定，这种事业在社会上引起了一定的重视，人们认识了它的应有作用的情况下加以总结和提提高，才逐步形成为系统的知识。大致说来，我国古代图书馆学产生和发展经历了这样的阶段。

1. 古代图书馆学思想的酝酿时期——汉魏六朝。

秦汉王朝的建立，为封建社会皇家图书馆的发展创造了条件。皇家图书馆积累先代

遗书，分工校勘、整理旧籍，编定《七略》、《别录》，当时有一定的分类原则和编目标准，是我国目录学成熟的标志，也是图书馆工作的内容系统、完整和专业化的开端。但是，图书馆工作局限于几个专家分头进行，尚无需事先制订出统一的遵守规则，而图书分类是在整理好全部藏书后，针对藏书品种和门类而设置的类目，也并非当今先编制分类表据以分书。所以，只能把《七略》、《别录》理解为目录学专著。

但是汉代产生了藏书沿革的记载，这主要是根据《七略》的辑略而缩成的《汉书·艺文志》的总序。《汉书·艺文志·序》，比较集中地说明汉初收集图籍，武帝时建设皇家藏书的经过，成帝时皇朝校书之组织。后人所借以考见群经授受源流，全据《艺文志》。而后人了解汉代典籍之聚散，亦有赖《艺文志》的序。

汉代文化学术思想的发展与皇家图书馆是密切不可分的。后汉东观，人们已十分重视它的作用。李尤等作《东观赋》、谓“敷华实于雍堂，集于质于东观。东观之艺、藁藜洋洋。”又谓“是谓东观，书籍翰林，列侯弘雅，治掌艺文。”初步认识藏书之功用。当时，张衡奏请《专事东观收拾遗文》，也是在认识皇家图书馆的地位后提出来的，这些都可说明对皇家图书馆的社会作用的认识已逐步提高。

魏晋以后，朝廷专设秘书监官员管理图籍之事。王肃等鉴于秘书属少府之不妥，曾建言说“秘书司先王之载籍，掌制书之典谟，与中书相亚，宜与中书为官联。”他的建议不仅在于提高藏书官员的地位，而且提出了如果隶属关系不改变，实际上是直接影响朝廷文化的发展。正是由于社会生活的实际需要，秘书监职掌对皇朝统治的重要性，魏晋南北朝一段时期，秘书监属封建朝廷重要机构，是朝廷中枢机关的一个部分。

南朝梁时，沈约针对皇家图书馆管理不善的情况，提出了皇朝藏书管理的方法，这是最早论及皇朝图书管理方法的专文。齐、梁时是我国中古时期图书目录事业发展极盛

时期，王俭《七志》、阮孝绪《七录》都在目录学发展上占有重要地位。现今存留的阮孝绪《七录》序，继承《汉书·艺文志》的传统，序中略记各代藏书故实，亦可看作是图书馆史文献之一部分。

由于图书(典籍)在社会生活中，特别是在皇朝统治中的特殊作用，汉魏六朝从封建统治者到图书馆官员，都有论述图书馆作用和重要性的文字。首先，他们认为经书的作用是治化的根本。汉陆贾之“天下不可马上治之”，提倡文教立国。汉武帝称“盖闻导民以礼，风之以乐，今礼乐崩坏，朕甚闵焉！”阮孝绪称“大圣挺生，应期命世，所以匡济风俗，矫正彝伦。非夫丘索墳典，诗书礼乐，所以成穆穆之功，致荡荡之化也哉！”其次，他们充分评价了经籍在皇朝统治中的作用，孙惠蔚称“六经百氏，图书秘籍，乃承天之正术，治人之贞范。……故大训炳于东序，艺文光于麟阁，斯实太平之枢宗，胜残之要道，有国之灵基，帝王之盛业。”这些都可看成是图书馆学思想的一部分。

综上所述，汉魏六朝从图书的作用，图书馆的认识，藏书管理思想和图书馆官员职能的分析，以及对历朝典籍兴聚散亡的记载，构成了当时图书馆学的基本内容：阐述典籍作用，重视国家藏书，藏书管理的严密化。这一般可称之为图书馆学思想和工作的研究，加上图书馆史的研究，构成了中世纪图书馆学的初步结构。

2. 古代图书馆学思想的形成时期——隋唐五代。

隋唐五代是我国中古时期文化极为繁荣的时代，我国古代图书馆学思想经汉魏六朝的酝酿，到隋唐时已逐步趋于完善。其主要表现在：

〈1〉图书典籍是“经邦立政”之大事之认识。牛弘把“大弘文教、纳俗升平”视为“为国之本”。魏征等进而说明经典图籍是“经天地，纬阴阳，正纪纲、弘道德，显仁足以利物，藏用足以独善。学之者，将殖焉！不学

者，将落焉！”把经典图籍视为皇朝统治的头等大事。这是在汉魏六朝对图书典籍作用认识的进一步深化。

〈2〉总结历代典籍聚散的五厄论出现。牛弘在上《请开献书之路表》中，总结秦汉以来典籍聚散的事实。归纳为五厄：即秦人吞六国，燹籍扫地，一厄也；王莽之末，并从焚燹，二厄也；献帝移都，西京燹荡，三厄也；晋世刘石凭陵，从而失坠，四厄也；侯景破梁，悉送荆州，周师入郢，焚之外城，五厄也。唐魏征修《隋书》作《经籍志·序》，同样总结了秦汉以来图书典籍之兴废，特别对魏晋南北朝的图书聚散，藏书校勘，分类，编目状况作了回顾性的评述，这也可看成是图书文献沿革史的著作。所以，都可认为是图书馆史研究的开端。

〈3〉藏书管理制度的总结。这主要是开始于《唐六典》关于监职和杜佑《通典·职官》中关于秘书监、秘书丞、秘书郎等的沿革、史实、职掌之记载。这些书籍之记载职官、是属于图书馆行政方面之专门材料。

〈4〉图书分类之理论化。阮孝绪《七录》，虽对所分类别有所说明，但仍然局限于部类成立的见解，《隋书·经籍志·序》中认为“夫仁义礼智，所以治国也。方技数术，所以治身也。诸子为经籍之鼓吹，文章乃政化之黼黻，皆为治之具也。”这就是四部分类的理论原则。同时，他们还对各类之类目设置，亦加以说明。到后晋刘昫的《旧唐书·经籍志·序》，则更把各部类之含义，内容分别加以论述。可以说，古代分类理论化的过程是比较漫长的。

3. 古代图书馆学体系建立时期——宋元时期。

宋代是我国古代文化发展的重要时期，社会经济的发达，城市经济的繁荣、雕版印刷的兴盛，都为图书的传抄、汇集、刻印、流传创造了条件。因此，宋代官府藏书不仅有皇家的宫廷藏书，而且有供政事参考、提供公开阅览之国家藏书——三馆秘阁。同时，

还出现了大量的私人藏书和作为教育机关——书院的藏书，可以说，宋代已构成了封建社会藏书制度的体系。藏书制度的发达，必然提供了对图书整理、利用的实践机会，这也就为形成图书馆学思想体系提供了条件。我国古代图书馆学体系在宋代形成的主要标志是：

〈1〉全面反映馆阁制度的专著出现。我国馆阁制度唐前是作为秘书监职责分别记载的，唐代弘文、集贤院有藏书，有职官，但未有专门著作记载它们。宋三馆秘阁是朝廷中的文化学术重要机构，担负着图书征集、储藏、校仇、整理，以及典籍利用等任务。南宋时程俱出于祖述先朝遗训、加强当代文献收集与保藏，使馆阁工作与管理制度化的目的，编纂了《麟台故事》。继之而起者有陈騏等的《中兴馆阁录》以及《中兴馆阁续录》，元代王士点等的元《秘书监志》。这些论述和记载我国古代馆阁制度的专著，由于书中论述问题多样，反映馆阁职能与作用全面，可视为古代图书馆管理制度的专门著作，也就是图书馆学的专著。

〈2〉图书收集、分类与整理理论专著的出现。南宋郑樵积累长期的实践经验，分别从求书八道，总结了图书馆藏书采访的经验，这是我国藏书建设理论之系统化。郑樵又总结自己在《艺文略》编撰中的实际体会，总述了图书分类的重要性、图书分类的作用、图书分类的归类方法等问题，这是图书分类工作研究的新突破。

〈3〉公私藏书沿革综合研究之开始。隋牛弘论藏书五厄后，唐代对藏书沿革之研究，主要表现在正史的“艺文”、“经籍”志体中，对私人藏书并未加以注意。宋元则有了显著的改变。一、补充牛弘未论及之事，如封演之说唐代藏书事实；二、增加私人藏书事实，如洪迈、周密之论及宋士大夫藏书，郑樵之论及民间藏书之家。三、搜辑藏书史料，如马端临《文献通考》之记载隋观文殿之书库装饰与设备，唐开元之集贤书院事实，

都是藏书制度研究深入之标志。

4. 古代图书馆学体系完善时期——明清。

刘国钧先生一九二六年评述中文图书馆学书籍时，曾说道：“我国藏书源流甚古，然重藏而不重用，且不过极少数人之事。虽典藏之道，亦语焉莫详，况流通管理之术乎。孙庆增之《藏书纪要》、号称精当，犹不能探求原理，参稽异同，考核得失，以成一有系统的著作。况其他乎。”刘先生站在介绍新的图书馆学说，推进图书馆事业发展的角度，指出古代图书馆学著作中之缺陷，如“流通管理之术”未能论及，确实是如此。但举及孙庆增等的图书馆学著作，认为亦不是“一有系统的著作”，这种看法是可以讨论的。

明清两代，在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中，已经进入后期阶段，从文化学术发展来看，则又是我国文化学术发展的重要阶段。明清两代，对我国古代文化遗产的整理与继承，是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的。现存大量古代文化典籍，基本靠明清二代加以搜罗收集，辑佚而系统地保留下来，这是一。先秦、西汉以至隋唐的文学艺术之宝贵遗产，靠明清两代文学家加以积累与继承，并在此基础上发展了中国古典文学艺术的优良传统，这是二。世界近代自然科学发展的成果，是靠明清两代学者加以介绍和研究，才逐步为我国人民所了解和认识，这是三。明清两代，文化学术事业发展的基本条件，如造纸、印刷工艺的发达，书籍发行渠道畅通多样，也是前代不可企及的，这是四。正因为文化学术的发展和书籍刻印流传的迅速，促进了我国古代图书馆的发展。明清两代，无论国家藏书（宫廷藏书）、私人藏书、寺院藏书、书院藏书都是很兴盛的，特别是适应文化学术研究的需要，私人藏书家大量涌现，我国古代图书馆学体系正是在私人藏书队伍中涌现出的图书馆学家完成的。

明清两代图书馆学体系完善的主要标志：

〈1〉官私藏书综合研究与专著之出现。这方面较早的如邱濬的《大学衍义补》中论及历代藏书情况。胡应麟的《少室山房笔丛》中的《经籍会通》篇论及历代公私藏书情况。到了清代，专门论及官府藏书的有《文澜阁志》、论及私人藏书的有《藏书记事诗》，论及地方藏书的有《武林藏书录》等。这些公私藏书综合研究之专章与专著的出现，说明图书馆在社会生活中地位的提高，说明各类型藏书的数量增加，同时，由于藏书类型多样，作用不同，也引起了藏书种类划分的不同意见。这类专章与专著可谓之图书馆状况与发展的研究。

〈2〉典籍作用与图书利用思想的发展。明清二代，承袭宋元以来部分藏书家藏书公开的传统，藏书家互相参观，互相借抄利用风气已开，所以藏书公开，建立公共藏书的思想 and 行动屡见于史料记载。曹溶之流通图书，周永年之建立“儒藏”等思想是最有代表性的。至于论述典籍作用之言论，上至明清各朝帝王，下至馆阁臣僚，更是比宋元时集中、深刻，更富于理论色彩了。

〈3〉藏书建设思想之建立与发展。郑樵之求书八法，较多着重于求书，即访书的经验总结。祁承煜对藏书建设方面之理论，已有所提高，图书购求之“眼界欲宽”，“精神欲注”、“心思欲巧”、“抄校欲勤”四论，图书鉴别之“审轻重”、“辨真伪”、“核名实”、“权缓急”、“别品类”五法，既融合前人经验、又渗透着作者几十年经验之积累。其中，注重当代史料之搜集、讲求实用之学，不求全求多，注意鉴别等思想，都是很有启发意义的。至于孙庆增之《藏书纪要》，论及藏书购求、鉴别、钞录、校仇、装订、编目、收藏、曝书，由此可知当时藏书建设之范围，藏书整理工作之内容和工作方法，这是封建社会藏书管理经验之集大成，是封建社会图书馆学之系统化著作。

〈4〉图书分类之理论化与图书目录体系之论述。图书分类之理论化可溯源于唐宋